

閱讀革命：《詩歸》的杜詩選評*

陳英傑**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晚明詩學史上最驚天動地的大事，莫過於鍾惺（1581-1624）、譚元春（1586-1637）出版《詩歸》，向雄踞百年的復古派投檄進兵。此書自信能掘發「古人精神」，企圖顛覆復古派對古人的膚廓知解，「閱讀」正是雙方交鋒的一個重要場域，因而可謂「閱讀革命」。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這場革命為晚明詩學史帶來哪些有意味的變化？對復古派產生什麼衝擊？本文緣此瞄準鍾、譚的「杜詩選評」，展開論析：首先鎖定《詩歸》所選杜甫（712-770）七律篇目，比較復古派前行選本，具體凸顯此書所捏塑的一套杜詩新典律。其次更深入的是，文中通過鍾、譚評點與杜詩文本的反覆磨勘，凸顯「可思而不可解」、「杜詩入理獨妙」、「性情語」，在在是劃時代的觀念。本文最後並對鍾、譚詩學意義提出扼要的歸結及評估。

關鍵詞：鍾惺，譚元春，《詩歸》，竟陵派，復古派，杜甫詩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神韻前史：以《詩歸》的杜詩選評為中心」（MOST 106-2410-H-004-166）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協辦：「跨類與出位：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工作坊」（南投：2020年11月6-7日），修訂稿復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賜正，謹申謝忱。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henyc@nccu.edu.tw

一、前言

艾略特 (T. S. Eliot, 1888-1965) 在其著名的〈傳統與個人才具〉(“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中，宣稱二十五歲以後若仍想成為一位詩人，須備「歷史意識」，也就是「不但要能夠透視『過去』，還要洞察過去之延續和它在『現在』的具現」。¹ 因此如何理解古代典式之作，認知其在當今創作的意義，實屬要務。惟若理解不一、認知有別，那麼文學流派風起雲湧之際，誰能真正引古接今的爭議，便將隨之引爆。回看中國文學史，崇古、學古之聲屢聞，但能建立理論體系並即時發揮深遠影響者，首推明代復古派；復古派的諸多流弊，更令竟陵派掀起晚明詩學史的「閱讀革命」。²

一般文學史書記載：晚明時期，鑑於復古派流弊叢生，公安、竟陵兩派代興爭雄，甚至一體劃歸「性靈派」。實則竟陵派的崛起，既有懲治復古派的銳意，也有訂正公安派的宏圖，其核心關懷正座落在對「古」的閱讀理解層次。據竟陵派旗手鍾惺 (1581-1624) 〈再報蔡敬夫〉云：

常憤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極狹、極套者，利其便於手口，遂以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曰：「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語似是，最能縈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又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³

所謂「嘉、隆間名人」、「護短就易之人」，號稱學古，顯指復古派。請先注意文中另一方人馬：「近時聰明者」，主張：「何古之法？須自出眼光」，顯然和復古派背道而馳，旨在倡導一種揚棄古人法度的創作，純任己意為之，很容易令人想起

¹ T. S. Eliot 著，翁廷樞譯，〈傳統與個人才具〉，《中外文學》，2.9（臺北：1974），頁 147。

² 周作人已曾拈用「革命」一詞概括竟陵派詩學精神，其〈陶筠庵論竟陵派〉云：「向太歲頭上動土，既有此大膽，因流弊而落于淺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態度。」周作人著，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7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83。

³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28，頁 470。原書部分句讀方式未盡愜當，引文逕予校改。

公安派巨匠袁宏道 (1568-1610) 的名言：「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⁴ 但鍾惺文中批評這類創作實踐績效欠佳，頂多只是盧仝 (795-835) 之境，⁵ 盧詩奇僻險怪，適巧也是袁宏道之輩的風格特徵。⁶ 鍾惺所謂「近時聰明者」，當是暗諷公安派。

依鍾惺的描述，公安派的詩歌創作，並不重視對「古」的閱讀理解；借用艾略特的說法，也就是詩歌創作毋需「歷史意識」。鍾惺對公安派創作績效欠佳的批評，顯則認為「古」不可輕言揚棄——這似是與復古派相近之處。但其實在〈再報蔡敬夫〉中，鍾惺也抨擊復古派對「古」理解偏差，直指復古派徒然偏嗜古人的「極膚」、「極狹」、「極套」，未能掌握「精神」。綜觀可知，鍾惺對復古派的批評，有別公安派轉趨於純任己意的「創作」，徹底斷開與「古」的連結；而是重新回歸到「古」的「閱讀」，以期肯認古人作品的「精神」。其具體成果，正是《詩歸》一書，〈再報蔡敬夫〉緊接著說：

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於此耳。⁷

《詩歸》係鍾惺、譚元春 (1586-1637) 合編的一部古逸至唐代詩歌選本，附有兩人評點，計含《古詩歸》15 卷、《唐詩歸》36 卷，萬曆四十五年 (1617) 刊行流通。⁸ 鍾惺自信《詩歸》「拈出古人精神」，對復古派「極膚」、「極狹」、「極套」的閱讀流弊，造成了革命性的衝擊。相同自信當然又見其〈詩歸序〉：

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於古人外，自為一人之詩以為異，要其異，又

⁴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4，〈敘小修詩〉，頁 187。

⁵ 按：盧仝號玉川子，以〈月蝕詩〉聞名，應即所言「玉川玉蟾」。

⁶ 有別於今人成見以為公安派詩風淺俗，袁宏道自述兼及友人之作：「所目既奇，詩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 10，〈五泄二〉，頁 450。袁中道亦謂宏道詩「力破時人蹊徑，多破膽險句」。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 21，〈書方平弟藏慎軒居士卷末〉，頁 891。

⁷ 鍾惺，《隱秀軒集》，卷 28，頁 470。

⁸ 萬曆四十二年歲暮，鍾惺、譚元春即已編成《古詩歸》、《唐詩歸》初、盛唐部分，中、晚唐部分則由鍾惺在萬曆四十四年十月至四十五年八月前單獨補入，至此《詩歸》始成足本。參見鄒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詩歸》成書考〉，頁 63。

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為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⁹

文中批評「捷者」刻意區隔於古人，其「險」、「僻」、「俚」，實為公安派的典型作風；又謂復古派徒取古人的「極膚」、「極狹」、「極熟」，行文旨趣均可呼應〈再報蔡敬夫〉。請特別注意文末又云：「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學古」與否，屬於「創作」層次的議題，鍾、譚不願乍然捲入泥淖，而是「第求古人真詩所在」，可證《詩歸》實是瞄準「閱讀」層次，企圖為詩壇闢出新路。因此，鍾惺〈與蔡敬夫〉說得非常清楚：

家居復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詩曰《詩歸》。稍有評註，發覆指迷。¹⁰

「深覽古人」正是閱讀古人，具體成果即《詩歸》一書的選目和評註（評點）。故綜言之，欲知鍾惺、譚元春《詩歸》的特色及其意義，勢須扣緊「閱讀」，同時也要和復古派相互對照。

依錢謙益 (1582-1664) 所述親身見聞：鍾、譚《詩歸》一出，即刻風靡，「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如尼丘之刪定」。¹¹ 甚至令人激動得血脈賁張，因痛憤竟陵詩學而對異議者施暴：「奮拳毆之」、¹²「張目批其頰」。¹³ 事過境遷之後，賀貽孫 (1605-1688) 仍稱《詩歸》選詩「殊有膽識」。¹⁴ 我們要問，這場浩大、激

⁹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刻本），卷首，頁 522。按：此書卷 1 至卷 1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89 冊，卷 14 以後收入第 1590 冊。

¹⁰ 鍾惺，《隱秀軒集》，卷 28，頁 468。

¹¹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丁集中，〈鍾提學惺〉，頁 570。

¹² 周亮工著，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第 3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因樹屋書影》，卷 4，頁 406。

¹³ 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卷 22，〈李沂〉，頁 698。

¹⁴ 賀貽孫，《詩筏》，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第 10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 10437。

昂的閱讀革命，究竟為晚明詩學史帶來哪些別富意味的變化？對復古派產生了什麼具體衝擊？這正是本文試圖探討的核心問題。

目前學界的竟陵派詩學研究，碩果纍纍，通盤性評介外，並能在復古派對照下朗現《詩歸》編選特色。如陳廣宏已指出：「其考察的基點已由詩歌作品之音律體製轉換到了作家的主體性情」，¹⁵ 與本文所見一致。有關《詩歸》取捨個別詩篇的情形，鄔國平歸結出：「黜落應制、公宴詩」、「多棄歷代傳誦的名作」，¹⁶ 引證、闡論俱頗詳實。尤值注意的是，楊玉成瞄準竟陵派「文學閱讀」的邊緣性格，對「選集」、「評點」、「斷片美學」的觀念，以及此中透露的世界觀，皆有深入剖析。¹⁷ 曾守仁接續探討鍾、譚悖離詩學傳統的「離心性」，構成了「幽靈詩學」，亦具啟發意義。¹⁸ 聚焦「唐詩」，陳國球注意到《詩歸》翻轉復古派選本詳盛略晚的取向，晚唐詩獲選比例大幅提昇，遂提煉出「應制詩」、「唐代五言古」、「情艷詩」、「別出之調」一系列議題，¹⁹ 確能凸顯鍾、譚詩學特識。但有別於前行研究，本文為求更具體地回應前揭的核心問題，認為必須抓緊「杜甫(712-770) 詩歌選評」，視之為這場閱讀革命的關鍵案例。何以故？

第一，統計《詩歸》選詩數據，杜詩獲選 314 首居全書之冠，在「盛唐」十九卷中高占六卷；其次王維 (701-761) 112 首（占二卷）、李白 (701-762) 98 首（占二卷），與杜甫差距懸殊，更非初唐、中唐、晚唐、甚至六朝以前任何一位詩人所堪比擬。綜觀中國古代選本之學，我們雖能發現入選篇數不必然反映選家的審美好惡，尚需參酌其他資料始能周全判定；但杜詩大幅占據《詩歸》版面，至少說明這是鍾、譚閱讀革命的重要場域。

第二，復古派號稱宗法盛唐詩歌，但於盛唐諸家中又對杜詩別具青眼。楊慎 (1488-1559) 嘗言李夢陽 (1472-1529) 「變而學杜」，掀起一代復古風潮；²⁰ 錢謙

¹⁵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第 7 章，〈竟陵派的文學思想〉，頁 397。

¹⁶ 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竟陵派的文學理論〉，頁 118。

¹⁷ 楊玉成，〈閱讀邊緣：晚明竟陵派的文學閱讀〉（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明清計畫專題座談」，臺北：2003 年 9 月 19 日，未刊修訂稿），頁 1-71。是文尋檢不易，承楊先生惠示此稿，謹申謝忱。

¹⁸ 曾守仁，〈魔、鬼與真詩——試論竟陵詩學話語中的離心性〉，《輔仁國文學報》，30（新北：2010），頁 213-220。另見曾守仁，〈冷人、幽器與鬼趣：試論鍾、譚的人、詩與批評〉，《文與哲》，18（高雄：2011），頁 415-424。

¹⁹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 5 章，〈復古派選本的反響——鍾惺、譚元春選《唐詩歸》〉，頁 232-273。

²⁰ 楊慎著，王大厚箋證，《升庵詩話新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4，〈胡唐論詩〉，頁

益攻訐復古派甚劬，仍要坦承：「弘治中學者以司馬、杜氏為宗，以不讀唐後書相誇詡為能事。」²¹ 復古派對杜詩的態度其實很複雜，無法三言兩語一概而論，但尊杜、學杜的基調實屬鮮明，何嘗單純視為一位尋常詩人。鍾、譚欲翻轉復古派，勢須致力於杜詩選評，否則無異於迴避復古派鋒芒，難以真正深入虎穴，擊中要害。故他們的杜詩選評，值得特予關注。

第三，鍾惺的復古派批評，乃影射復古派所標舉的杜詩圖像。前引鍾惺〈再報蔡敬夫〉曾載錄復古派的聲音：「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指復古派不滿公安派純任己意的創作，認為一切詩藝終難脫離古人籠罩。其〈詩歸序〉又載：「千變萬化不出古人」，此指復古派眼中，公安派雖自詡「千變萬化」，自認突破格套，實則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蓋「古人」才是真正的「千變萬化」。譚元春〈詩歸序〉也有相仿的說法。參據復古派詩學傳統，這種富於變化且能強勢籠罩群言的「古人」，並非泛指任一古代作家，正以杜甫為典範，斯謂「集大成」。可知鍾惺批評復古派藉口「千變萬化」，徒然僅得古人的「極膚」、「極狹」、「極套」、「極熟」，乃是影射復古派無法領會「杜詩」的「精神」。為翻轉復古派，《詩歸》的杜詩選評如何展現新異性？這是一個值得仔細釐清的問題。

第四，遍觀《詩歸》的杜詩評語，多屬推崇有加。譚元春更在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的評語中禮讚：「老杜第一詩人，又是第一高人；人不第一，恐詩亦不能第一也」，²² 此等崇敬乃全書僅見。可知《詩歸》多選杜詩，且特尊杜詩。鍾惺對杜詩並曾下過一番苦讀工夫，〈夜閱杜詩〉云：

束髮誦少陵，抄記百相續。
閒中一流覽，忽忽如未讀。
向所覲面過，今焉警心目。
雙眸燈燭下，炯炯向我矚。²³

鍾惺回顧自己讀杜歷經兩個階段：「束髮」的階段允謂用功，但所知解的杜詩猶在其「面」，洵非深刻；「今焉」的階段，則「警心目」，震懾之際，並能刷新對杜

215。

²¹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35，〈贈別方子玄進士序〉，頁 993。

²²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7，頁 44。

²³ 鍾惺，《隱秀軒集》，卷 2，頁 10。

詩的領會，故恍惚錯覺往昔根本不曾讀杜。鍾惺於焉巧筆設喻：此刻杜甫的炯炯眼神竟浮出紙墨，與「我」相接。此一象喻也寫入譚元春〈詩歸序〉，是知鍾惺讀杜經驗的飛躍，乃與《詩歸》一書的編選立意完全通浹，何啻亦可視為一場返照自身的閱讀革命。

上述四點各自獨立，實亦逐層深入，足可支撐本文聚焦探究鍾、譚的「杜詩選評」。後續我們將運用更堅強、充分的資料，立體描繪《詩歸》「閱讀革命」的具體情況，終而貞定其在晚明詩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二、《詩歸》選杜新貌：以「獨與世異同」的七律為例

綜觀《詩歸》采錄杜詩 314 首，以詩體言，含五古 97 首、七古 30 首、五律 123 首、五排 21 首、七律 32 首、七絕 11 首，未選五絕。除七絕〈絕句漫興（其一）〉外，皆附鍾、譚評點。不過，五律〈贈別韋贊善〉譚元春批語中拈及「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評價相當正面，²⁴ 其實摘自杜甫另一篇五律〈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而《詩歸》未選；若計入此篇，則《詩歸》所舉杜詩多達 315 首。再者，《詩歸》選古詩部分（即《古詩歸》部分），有 2 處評語連帶提及杜甫；選其他唐代詩人部分也有 19 處提及杜甫。

《詩歸》的基本調性是一部「詩歌選本」，其對特定詩人及其作品的取捨，最能左右讀者的觀感。因此，我們首須查驗：《詩歸》所選杜詩之篇目，是否顯現新貌？近年陳美朱曾據《詩歸》選杜甫五古所占比例最高，為文探討「《唐詩歸》所關注的五言古體」，並對照到「〔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所著眼的七言古詩和七言律詩」，以示兩者各有偏重。²⁵ 其文論述翔實，足資參考之處甚多。然而如此框架，或恐令人誤會鍾、譚不甚關注七律議題，蓋七律乃沈氏所側重者。實際上，鍾惺對杜甫「七律」一體的選目，尤富標新立異之自覺，他在所選 32 首杜甫七律末端附識一段極具總括意義的批語：

予於選杜七言律，似獨與世異同。蓋此體為諸家所難，而老杜一人選至三十餘首，不為嚴且約矣。然於尋常口耳之前，人人傳誦、代代尸祝

²⁴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20，頁 79。

²⁵ 詳見陳美朱，《明清唐詩選本之杜詩選評比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第 3 章，〈《唐詩歸》與《唐詩別裁集》之杜詩選評比較〉，頁 58-68。

者，十或黜其六七。友夏云：「既欲選出真詩，安能顧人唾罵，留此為避怨之資乎？」知我者老杜，罪我者從來看杜詩之人也。²⁶

鍾惺提到《詩歸》選杜七律多達 32 首，自認執法寬鬆，不算「嚴」、「約」。儘管如此，文中強調所選篇目，刻意悖離世俗偏好，而且達到了「十或黜其六七」的劇烈程度。據文中徵引譚元春語，可知他對杜甫七律革命性的選定，重在「選出真詩」，恰能印證《詩歸》的核心旨趣。我們實可聚焦七律，藉以凸顯《詩歸》由選杜篇目所展示的新貌。²⁷

為清楚凸顯《詩歸》選杜篇目新貌，必須參照李攀龍 (1514-1570) 選本。李攀龍無疑是復古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譚元春〈詩歸序〉批評世人：「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求於靈迴朴潤」，²⁸ 所指「《詩刪》」，正是李攀龍所編選的《古今詩刪》，可推證《詩歸》新貌之展現，乃是刻意翻轉《古今詩刪》而來。李攀龍此書選詩，「始於古逸，次以漢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之後繼以明」，²⁹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當中選唐詩的部分。而且，《古今詩刪》，也是整部《詩歸》中唯一明文述列的前行唐詩選本。另應注意的是，鍾惺評點也屢將李攀龍視為所欲對話的負面座標，如常建 (708-765) 〈西山〉評：「于鱗知取此作，而遺前後數首，何也？」³⁰ 杜甫〈後出塞（朝進東門營）〉評：「〈出塞〉前後，于鱗獨收此首，孟浪之極」，³¹ 這些說法並非針對《古今詩刪》，係在商榷李攀龍選唐詩的另一版本，即蔣一葵箋釋的《唐詩選》。³² 《古今詩刪》選唐詩之篇目，與《唐詩選》稍有差異，俱為鍾、譚參考，自宜一併列入比較。又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哪一版本，李攀龍選本問世後，立遭復古派內部非議；相形之下，明初高棅 (1350-1423) 《唐詩正聲》則因取捨精嚴，甚得復古派擁戴，聲勢愈趨高漲。故為周全起見，我們應將

²⁶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22，頁 101。

²⁷ 按：我們雖擬聚焦探討「七律」，其實鍾、譚對七律以外杜詩諸體的選評，也不乏新見，唯因篇幅限制，文中不便面面俱到。待後文深入探查鍾、譚的評點，即能彰顯綜觀諸體的研究視野。

²⁸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首，頁 524。

²⁹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189，〈《古今詩刪》提要〉，頁 1717 中。

³⁰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2，頁 671。

³¹ 同前引，卷 17，頁 39。

³² 參見許建業，〈舊題李攀龍《唐詩選》的早期版本及接受現象〉，《文學遺產》，5（北京：2018），頁 155。

《唐詩正聲》一併列入比較。

綜合言之，本文將比較《唐詩正聲》、《古今詩刪》、《唐詩選》與鍾、譚《詩歸》所選杜甫七律之情況，³³ 請先參閱表一。

表一：《唐詩正聲》、《古今詩刪》、《唐詩選》、《詩歸》所選杜甫七律

杜甫七律篇目		《正聲》	《詩刪》	《詩選》	《詩歸》
秋興	其一：玉露凋傷	○	○	○	
	其二：夔府孤城	○			
	其三：千家山郭			○	
	其五：蓬萊宮闕	○	○	○	
	其七：昆明池水	○	○	○	○
紫宸殿退朝口號		○		○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			
玉臺觀		○			
登樓		○		○	○
蜀相		○			
野老		○			○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			
夜		○			○
詠懷古跡	其三：群山萬壑	○			
	其五：諸葛大名				○
閣夜		○	○		
返照		○	○	○	○
九日登高（又作：登高）		○	○	○	
題張氏隱居			○	○	○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	○	
九日藍田崔氏莊			○	○	○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 相憶見寄			○		○
野望（又作：望野）			○	○	
吹笛			○	○	
曲江對酒				○	

³³ 本文所據版本為高棟，《唐詩正聲》（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奎文館主人識本）；李攀龍選，《古今詩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3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李攀龍編，蔣一葵箋釋，《唐詩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明刻本）。

表一：《唐詩正聲》、《古今詩刪》、《唐詩選》、《詩歸》所選杜甫七律（續）

杜甫七律篇目		《正聲》	《詩刪》	《詩選》	《詩歸》
曲江二首	其一：朝回日日				○
	其二：一片花飛				○
題鄭縣亭子					○
望嶽					○
崔氏東山草堂					○
賓至					○
南鄰					○
客至					○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其一：得歸茅屋				○
愁					○
示獠奴阿段					○
白帝					○
白帝城最高樓					○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鶩飛避煖勁翻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其一：雲飛玉立				○
	其二：黑鷹不省				○
即事					○
見螢火					○
暮歸					○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
又呈吳郎					○
潭山人隱居					○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
小寒食舟中作					○
篇數合計		16	12	14	32

可知《詩歸》所選杜甫七律總篇數，幾以兩倍之差，遠多於《唐詩正聲》、《古今詩刪》、《唐詩選》諸本，鍾惺自認選杜並不算是「嚴」、「約」，良有以

也。更重要的是，依據表一的篇目對列，實能彰顯《詩歸》的選杜新貌得自於兩個層面：一是「刪汰」，二是「增選」。就「刪汰」來看，《唐詩正聲》所選 16 首中，有 11 首遭《詩歸》刪汰，僅有 5 首重疊，刪汰率達 68.75%；《古今詩刪》、《唐詩選》篇數僅有小異，故合併統計共 16 首，有 10 首遭《詩歸》刪汰，僅有 6 首重疊，刪汰率達 62.5%。刪汰率之高，顯示復古派詩學傳統中的不少杜詩代表作，無法進入鍾、譚法眼，可證鍾惺前云：「十或黜其六七」。再就「增選」來看，鍾、譚所選 32 首中，有 24 首是高棅和李攀龍未選，增選率達 75%。這是鍾、譚選杜之為新貌的關鍵，世人只要翻開《詩歸》，即可目擊大量復古派詩學傳統中未選之作，耳目一新自不待言。鍾、譚簡直入室操戈，捏塑出一套杜詩新典律 (canon)。

值得進一步檢驗的是，《詩歸》若干篇目係與高、李「共選」，能否視為鍾、譚偶或趨合於復古派？其實不然。如〈秋興·昆明池水〉為諸本共選，〈九日藍田崔氏莊〉亦為鍾、譚與李攀龍共選，但鍾、譚的採錄標準實為獨特。且看鍾惺評〈九日藍田崔氏莊〉云：

凡雄者貴沈，此詩及「昆明池水」勝於「玉露凋傷」、「風急天高」，蓋以此。……特錄此黜彼，以存真詩。³⁴

可知《詩歸》採錄〈九日藍田崔氏莊〉、〈秋興·昆明池水〉的情況，必須置入其他兩首杜詩「玉露凋傷」（〈秋興〉其一）、「風急天高」（〈九日登高〉）相互比較的評議脈絡來審視。這兩首杜詩，高棅和李攀龍皆選，唯獨《詩歸》刪汰不選，依鍾惺的暗示，其間取捨涉及「真詩」的認定問題。

王世貞 (1526-1590)《藝苑卮言》曾一併提及前揭四首杜詩：

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沉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³⁵

先是坦承四詩各有瑕疵，終覺難分軒輊，四詩均為佳作，均有資格進入「七律壓

³⁴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22，頁 97。

³⁵ 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卷 4，頁 233。

卷」的候選清單。這和李攀龍併選四詩而不加取舍的思維，頗有類近之處。換言之，王世貞雖曾質疑李攀龍並未真正識察杜甫七律，³⁶ 但關於四詩旗鼓相當的評價態度，雙方咸有共識。相形之下，鍾、譚卻將四詩割裂為兩組，逕予「錄此黜彼」，展現一種迥然不同的選評眼光。

在前揭〈九日藍田崔氏莊〉評語中，鍾惺暗示〈秋興·昆明池水〉、〈九日藍田崔氏莊〉為「真詩」，但若脫離這段評語將四詩分為兩組而抑揚之的脈絡，他的評價態度就會隨之鬆動，〈秋興·昆明池水〉鍾惺總批：

〈秋興〉偶然八首耳，非必於八也。今人詩擬〈秋興〉已非矣，況舍其所為「秋興」，而專取盈於八首乎？胸中有八首，便無復「秋興」矣！杜至處不在〈秋興〉，〈秋興〉至處亦非以八首也。今取此一首，餘七首不錄，說見《詩砭》，予與譚子分謗焉。³⁷

鍾惺批評今人刻意摹擬杜甫〈秋興八首〉時，必湊八首之數，質疑有違自然興感之道。「今人」指復古派，李夢陽有七律〈秋懷八首〉，何景明（1483-1521）也有七律〈秋興八首〉，王世貞亦曾讚揚時人穆文熙（1528-1590）、徐茂賢（生卒年不詳）「擬少陵〈秋興〉八首」、「八章足嗣〈秋興〉」，³⁸ 堪當佐證。復古派最惹非議的摹擬之弊，癥結亦正在此。但依這段批語，我們還要追問：鍾惺在〈秋興八首〉中僅取「昆明池水」，是否表示精選賞愛之意？他雖曾暗示此詩為「真詩」，但批語直言不諱：「杜至處不在〈秋興〉」，其論述脈絡通指「八首」，可知他並不覺得包括「昆明池水」一章在內的〈秋興八首〉，足以代表杜詩巔峰。〈九日藍田崔氏莊〉處境相仿，鍾惺評杜甫〈夜〉云：

同一清壯，而節細味永，按之有物，覺「老去悲秋」、「昆明池水」等作皆遜之。³⁹

相較於〈秋興·昆明池水〉、〈九日藍田崔氏莊〉，鍾惺更推崇〈夜〉，後者想必

³⁶ 王世貞嘗云：「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者。」同前引，頁 227。

³⁷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22，頁 99。

³⁸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84 冊，《續稿》，卷 165，〈穆光胤書父文熙詩〉，頁 392；卷 182，〈徐茂賢〉，頁 607。

³⁹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22，頁 99。

更有資格被視為「真詩」。李攀龍未選〈夜〉，令人懷疑：鍾惺此一評語或許有意透過壓低〈秋興·昆明池水〉、〈九日藍田崔氏莊〉，去撇清《詩歸》和李攀龍選本的重疊，旨在彰顯一己對於「真詩」的獨具慧眼。這也提醒我們不能僅以詩作之獲選表象，就忽略了詩作之間的評價差異。縱使這些詩作都能在不同評述脈絡中被視為「真詩」，並不直接反映其在竟陵詩學中處於核心抑或邊緣的位置。

〈夜〉曾獲高棅采錄，故或許仍不算是最具革命性的選目，更能引人目光的是〈覃山人隱居〉，鍾惺評曰：

深心高調，老氣幽情，此七言律真詩也。汨沒者誰能辨之！⁴⁰

譚元春亦評曰：

此老杜真本事，何不即如此作律，乃為〈秋興〉、〈諸將〉之作，徒費氣力，煩識者一番周旋耶！⁴¹

綜合鍾、譚評語來看，〈覃山人隱居〉被標舉為「真詩」，其價值遠勝於〈秋興八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前已論及，茲不贅言；〈諸將五首〉完全未獲《詩歸》采錄，譚元春評杜甫五律〈喜達行在所三首〉亦云：「〈諸將詩〉肯如此做，即妙絕」，⁴² 可知這組詩作確實不受鍾、譚青睞。相形之下，鍾、譚對〈覃山人隱居〉非但推崇備至，此篇又是高、李所未選者，在選目上特能彰顯獨特性、新異性。此中別富意味的是，鍾、譚在評點中譏諷「汨沒者」，儼然自居「能辨之」的「識者」，清楚展現一種與世頡頏的桀驁形象，這也正是革命家的姿態。他們儼然向世人大聲宣告：「杜詩」雖是一個老話題，但對於杜詩「真詩」篇目的選定，決非簡單承襲文學傳統而來，特有賴於個人靈慧獨具的讀者之眼！⁴³

⁴⁰ 同前引，頁 101。

⁴¹ 同前引。

⁴² 同前引，卷 21，頁 85。

⁴³ 有關《詩歸》成書後復古派如何反應，學者曾以許學夷（1563-1633）、唐汝詢（1565-1659）為例立論，見陳英傑，《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第 6 章，〈許學夷的杜詩學〉，頁 389-405；陳國球，〈復古餘波——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初探〉，《政大中文學報》，29（臺北：2018），頁 67-73。這可視為探討《詩歸》「新貌」的另一思路。

三、轉語：《詩歸》的杜詩評點

以一部選本的編纂而言，《詩歸》采錄之作，並非反映鍾、譚的閱讀範圍，而是鍾、譚希望世人閱讀的篇目。「真詩」也不僅是《詩歸》的采錄標準，更是鍾、譚希望世人掌握住的某種重要特質。因此，我們不能泛談「真詩」的定義，必須即事言理，緊扣鍾、譚對具體詩作的「評點」。誠如鍾惺〈再報蔡敬夫〉的自我期許：「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手口作聾瞽人燈燭輿杖」，⁴⁴「轉語」為佛學術語，常見禪宗燈史，指禪師機鋒之語，旨在撥轉學人心機，使之褪革癡迷，徹悟大道，此處顯然喻指「評點」。要之，鍾、譚的「評點」，究竟如何接引世人讀出「真」的杜詩？這是我們必須緊續探究的問題。

(一)「可思而不可解」

前人已注意到《詩歸》的評點形式常針對單一或局部文句而發，目為「區區字句焉」、⁴⁵「數十字之學」，⁴⁶且不論評價高低，這確實是鍾、譚詩學一大特色，杜詩評點當然不例外，諸如「○字妙」、「○字奇」一類表述自復不少，甚至還在詩行間的夾批逕稱「妙」。這類資料未必提供進一步的論證、分析，大多是三言兩語，非常簡潔，頗具神祕感。但與其認為鍾、譚僅是寫出其對單一或局部文句的「初步印象」，⁴⁷我們更應推究此一評點特色所因依的重要詩學觀念。請看鍾惺評杜甫〈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斟酌旅情孤」句：

「斟酌」二字，若不可解，妙！妙！⁴⁸

「斟酌」指酌酒，義非艱澀，鍾惺卻宣稱二字「妙」在「若不可解」，可知他並不

⁴⁴ 鍾惺，《隱秀軒集》，卷28，頁470-471。

⁴⁵ 方以智，《通雅詩說》，收入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第10冊，頁10589。

⁴⁶ 王夫之評選，陳新校點，《明詩評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卷6，袁宏道〈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頁319。

⁴⁷ 黃維樑，《中國古典文論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詩話詞話和印象式批評〉，頁75。

⁴⁸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17，頁102。

是著眼於文義訓詁上的難易問題。其實，「不可解」原是復古派常見的詩學論述，指詩歌的真正美妙之處，無法利用邏輯明晰的語言形式來準確認知、陳述。⁴⁹ 鍾惺此處似與復古派暗通款曲，杜甫〈送遠〉鍾惺總批亦云：

妙在八句佳處，尋不出，說不破。⁵⁰

「尋不出」指找不到杜詩的妙處，亦即無法準確辨析杜詩的妙處。當然，鍾惺絕非批評杜詩乏善可陳，「說不破」便讚譽杜詩內蘊豐厚，永遠闡說不盡。杜甫〈月夜憶舍弟〉「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鍾評：

只說境，含情往復，不可言。⁵¹

此詩景中含情，其情無法言說，正即所謂妙不可言。這顯然仍是「不可解」的觀念。據《詩歸》杜甫卷首鍾惺云：

讀老杜詩，有進去不得時，有出來不得時。諸體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⁵²

這裡提供了鍾惺的讀杜經驗：「進去不得時」指杜詩難讀，試配合前引鍾惺〈夜閱杜詩〉來推敲，可更確切詮解為杜詩中彷彿有一雙炯炯眼神浮出紙張、墨跡般的「精神」，無法輕易領略。如欲領略，須賴「思」的工夫，稍後詳論，暫先按下。所謂「出來不得時」，指「進去」之後，讀者雖能感知杜詩的「精神」，仍無法運用語言將妙處準確闡發出來，可對應到前述的「不可解」之說。鍾惺這段評語寫在杜甫專卷之首，具「總評」性質，可知「不可解」之說，乃被推奉為杜詩的一種整體質性。故文末揭示：杜詩各體、各篇、各句，甚至用字遣詞細微處，皆展現了「不可解」的美妙。

撮要言之，「不可解」暗示杜詩的奧妙，無法透過邏輯明晰的語言形式給出標

⁴⁹ 參見黃景進，〈詩之妙可解？不可解？——明清文學批評問題之一〉，收入呂正惠、蔡英俊主編，《中國文學批評（第一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23。

⁵⁰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20，頁79。

⁵¹ 同前引。

⁵² 同前引，卷17，頁38。

準化的答案，只要一涉理路，一落言筌，致力追尋一種「理性」的詮釋，就會堵塞了杜詩原本可能為讀者無窮示現的美感。借用楊玉成的說法，「詩的陳述因字面的矛盾錯亂而摧毀自身，自我解構，留下一種無法言說的原初感受。」⁵³ 譚元春評岑參 (715-770) 〈還高冠潭口留別舍弟〉因此亦云：「與別弟等語，俱未說出，俱說出矣！如此而後謂之『詩』，如此看詩，而後謂之『真詩人』」，⁵⁴ 岑詩妙不可言，即「不可解」，可見此說也是對「詩」、「看詩（讀詩）」規制了一個新定義。

承前所述，鍾、譚面對詩歌文本，幾無長篇大章的論析，大多利用評點簡潔素描「初步印象」，這顯然也和「不可解」之說息息相關。換個角度來看，由於旨在掘發「不可解」的奧妙、隱微，鍾、譚不得不採取簡潔的「評點」，方能得其立足之處，「如果某人在教導奧秘時不想使用比喻和密語，他就不得不換用簡短而晦澀的言辭」，邁蒙尼德 (Maimonides, 1138-1204) 《迷途指津》(*Guide for the Perplexed*) 此說恰可互證。⁵⁵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觀念同時導致鍾、譚評點的效用，迥異於「箋注」。《詩歸》選詩眾多，對詩中艱澀語彙、異文版本、典章故實和傳記背景等訊息，則全無箋解注釋，可想見鍾、譚的「評點」，或能接引世人去感受古人詩中的不可言傳之妙，卻未必能協助讀者就認知的層面去「讀懂」作品。杜甫〈遊龍門奉先寺〉最為典型之例，鍾惺評其「天闕象緯逼」句：

「天闕」句，不必解，自是奇句！⁵⁶

「闕」字在整句詩意而言，頗為艱澀，故宋代以降多有疑其訛誤，甚至有人校訂為「關」、「閱」、「窺」，⁵⁷ 以求順解。鍾惺卻悍然聲稱「不必解」。按：此與「不可解」之說稍有區別，「不可解」指妙不可言，「不必解」卻是抗拒客觀性的箋注和校訂。這種態度和世人差異很大，如譚元春對同一首詩的觀察：

⁵³ 楊玉成，〈閱讀邊緣〉，頁 33。

⁵⁴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3，頁 681。

⁵⁵ 相關討論見列奧·施特勞斯 (Leo Strauss) 著，劉鋒譯，《迫害與寫作藝術》（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頁 60。

⁵⁶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8，頁 49。

⁵⁷ 陳巖肖《庚溪詩話》記載：「後人為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關』，王介甫改為『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窺』，引《莊子》『用管窺天』為證」。陳巖肖，《庚溪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上，頁 169。

今人自無慧心，於古人語言不解處，即疑恨其脫誤，妄者遂下筆改之，悻哉！⁵⁸

如此疑恨脫誤甚而改字的世俗心理，旨在追尋「正確」（非脫誤）的版本，乃是偏執地求索一種標準化的杜詩詮釋方案，鍾、譚無法苟同。王世貞《藝苑卮言》曾說：「『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窺』、『天閱』，咸失之穿鑿」，⁵⁹反穿鑿的態度自屬通達，實則仍以「舊字」為依歸，追尋一個「較好」（不穿鑿）的版本；他在另一段話中也曾摘句比較「杜詩善本勝者」，⁶⁰可知較諸鍾、譚之抗拒箋注和校訂，昭昭有別。換言之，王世貞是能讀懂「舊字」，故認為「天闕」並無疑義，「天窺」、「天閱」皆有穿鑿之病，這是一種自認得其正解的讀法；鍾、譚與王世貞似近實異，蓋認為「於古人語言不解處」既不必妄改之，更宣稱「不必解，自是奇句」，因此，能否讀懂「天闕」之義並非他們關心所在，兩人評語中對這個歷來頗具爭議性的詞彙也沒能提出疏釋，這就是不必求其正解的讀法。此中透露一種奇特的觀念：面對一首艱澀難通的詩作，「讀懂」與否完全不成問題，因為縱使不懂「闕」字之義，甚至未能掌握世人所謂正確、較好的版本，也無礙欣賞此句之「奇」。

這種觀念除可溯及宋元之際的劉辰翁（1232-1297），⁶¹尚須注意與復古派要角謝榛（1499-1579）的關連，其《詩家直說》云：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跡可也。⁶²

明人對「可解」、「不可解」的詩學議題雖討論不少，最具突破性之說恐怕要推謝榛的「不必解」。鍾、譚接過這個話頭，再行添加「可思」之說，遂更具爆發力。請注意杜甫〈自閩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鍾惺夾批：

可思而不可解，至幻，至細。癡人必欲求解，竟以不可解之故，而置之

⁵⁸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18，頁49。

⁵⁹ 王世貞，《藝苑卮言校注》，卷4，頁264。

⁶⁰ 同前引，頁263。

⁶¹ 楊玉成，〈閱讀邊緣〉，頁32。

⁶² 謝榛著，李慶立、孫慎之箋注，《詩家直說箋注》（濟南：齊魯書社，1987），卷1，頁11。

不思矣。此讀詩之難也。⁶³

鍾惺批語隱含兩個重點：第一，讀者若「必欲求解」，便屬癡迷。我們不難理解，這是基於「不可解」的觀念，也是「不必解」的觀念。第二，鍾惺還拈出了「可思」。此說兼涉兩個層次：一是「讀者」的思維能力，讀者對詩歌美感的領會，如杜詩之「至幻」、「至細」，必須仰賴「思」。鍾惺批評癡人：「竟以不可解之故，而置之不思矣」，可知他所謂「不必解」，主要訴求並非單純抗拒箋注和校訂，其實在於逼顯讀者的「思」。換言之，癡人之所以為「癡」，並非只是「必欲求解」，癥結在於「不解」時又「不思」。文末感嘆：「此讀詩之難也」，何啻是強調：「思」是閱讀活動中最難能可貴的關鍵能力。何以關鍵？其效用正在掘發詩歌文本中「不可解」的無窮美感。茲舉一例，杜甫〈天末懷李十二白〉「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句，鍾惺評：「大發憤，卻是實歷語」，⁶⁴ 其悲憤令人不忍卒讀，這也正是譚元春評語所謂：「十字讀不得」，但譚評隨即補述：「然深思，正耐多讀」，⁶⁵ 可知仰賴讀者「深思」之後，反覆尋味，就能領略到杜詩無窮美感。

「可思」的第二個層次，指涉「作品」的語言藝術。這與前述第一個層次可謂一體兩面，杜詩語言藝術的「可思」，形成了某種召喚結構 (Appellstruktur)，因而亦為讀者之「思」的投射對象。如鍾惺評杜甫〈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三）〉「影靜千官裡」句：「『影』、『靜』二字，深妙可思」，⁶⁶ 便具體抓住作品中特定字彙的用法「深妙」，是以「可思」。循此遍觀《詩歸》中的杜詩評點，我們不難發現一套反覆出現的表述模式，如〈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鍾評：「『權』字畫出老奸形神，許多機鋒在內」，⁶⁷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鍾評：「『兼』字說老態工甚」，⁶⁸ 〈對雪〉鍾評：「一『似』字寫得荒涼在目」，⁶⁹ 皆由小見大，抓住杜詩單一字彙而讀出豐厚意義。另如〈新婚別〉「形勢反蒼黃」，鍾評：「五字吞吐難言，羞恨俱其中」，⁷⁰ 〈雨

⁶³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21，頁 86。

⁶⁴ 同前引，卷 20，頁 78。

⁶⁵ 同前引。

⁶⁶ 同前引，卷 21，頁 86。此詩原是「其三」，《詩歸》寫作「其二」。

⁶⁷ 同前引，卷 18，頁 51。

⁶⁸ 同前引，卷 20，頁 79。

⁶⁹ 同前引，卷 21，頁 91。

⁷⁰ 同前引，卷 17，頁 39。

過蘇端〉鍾評：「『一飯即〔跡〕便掃』五字，有分曉，有斟酌，許多嗟來嘍蹴之感，俱在其中」，⁷¹ 皆注目局部文句。這類例子不限杜詩，整部《詩歸》俯拾即是，似常令人覺其瑣碎；但結合前面的討論看來，這恐怕正是鍾、譚刻意追求的型式，其以讀者之姿，試圖掘發單一字彙或局部文句中的豐厚意義，可謂「思」之能力的實例演示。

關於那些實例演示背後的理論依據，亦即「可思而不可解」的觀念，鍾、譚並於杜詩評點中反覆提示。譚元春評〈西閣雨望〉「萬慮傍簷楹」句：

有可思不可解之妙。⁷²

又如杜甫〈送遠〉全篇加圈外，鍾惺尚有一段尾批：

深甚，不在不可解，而在使人思。⁷³

前文曾引述鍾惺總批讚賞此詩妙處：「尋不出，說不破」，亦即「不可解」。這段尾批則補述此詩之「深」，並非由於「不可解」的緣故，而在於詩歌文本召喚了讀者之「思」，參與了無窮美感的創造。鍾惺接著說：「若以不可解求深，則淺矣」，⁷⁴ 仍認為若刻意求解，反倒是淺看了杜詩。

如前所述，「不可解」原屬復古派詩學常談，「不必解」亦與謝榛之說相仿，但通過「可思」之說的論述和大量實例演示，居然改頭換面，躍為竟陵派別具特色的論述。這個觀念自然被譚元春寫入〈詩歸序〉：

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⁷⁵

這段序文有助於進層掌握「思」的樣貌。譚元春認為，讀詩的目標在於掌握古人

⁷¹ 同前引，卷 18，頁 50。

⁷² 同前引，卷 21，頁 88。

⁷³ 同前引，卷 20，頁 79。

⁷⁴ 同前引。

⁷⁵ 同前引，卷首，頁 524。

「性靈」，一如鍾惺〈夜閱杜詩〉，他也使用了古人雙眸炯炯的象喻；但文中特別強調此一「性靈」的獨特性：「決不與眾言伍」，而非人云亦云般的浮光掠影。如何方能達致此一目標？這就是所謂：「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細加推敲：第一，「專其力」、「壹其思」皆指讀者的專壹致志，這是具體描述讀者之「思」的樣貌，絕非泛然隨意的瀏覽，故文末補述：「亦非苟然而已」。我們於焉可以設想，鍾惺在〈夜閱杜詩〉之發生讀杜經驗的飛躍，應非屬於靈光乍現的自然妙悟，主要是仰賴長期鑽研苦索的思維周旋。第二，譚序明言，讀者之「思」，乃朝向於掘發古人的「性靈」，這是否仍深陷「必欲求解」的窠臼？亦即評點活動是否仍為「解」？我們不應輕放譚元春至關緊要的一句話：「自出眼光之人」，這透露讀者之「思」的運行，實非為了追尋古人作品中某種客觀存在的旨義，提出確解，而是憑靠讀者自身獨特的「眼光」，去與古人交通。既講究「自出眼光」，又期許掘發古人潛德幽光，當然不簡單，亟須專壹致志、鑽研苦索，這種閱讀活動遂迥別於主觀性、隨意性的閒談漫話了。

譚元春序中的「性靈」，鍾惺稱為「精神」，其〈詩歸序〉對如何探求古人的「精神」，也有扼要論述：

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
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⁷⁶

鍾惺指出，讀者要透過「虛懷定力」，去體察古人作品中的「幽情單緒」、「孤行靜寄」。「虛懷定力」指虛靜專壹的思維樣貌，「幽」、「單」、「孤」、「靜」一連串的形容，乃至「冥遊于寥廓之外」一語，相對於熱鬧喧囂或塵俗之境，皆是在指稱古人「精神」的獨特性。鍾惺這段說法雖不比譚元春清晰，仍能相互發明。

但鍾序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定義：「真詩者，精神所為也」，乍看之下，這似是係就創作層面去說古人內蘊之「精神」，外顯為「真詩」。然而不然，因為古人之「精神」，實非繫諸「作者」，而是存在於「作品」，這又召喚「讀者」的抉微。換言之，「真詩」的創造，非僅創作層面一端。鍾惺想必深鑑於此，故後文緊續轉入了「察」（閱讀）的話題。

這樣看來，我們便得逼問：杜詩作為「真詩」的重要範例，鍾、譚在其評點中究竟能為世人提供什麼？無非就是杜詩的「精神」、「性靈」，而那又難免沾染兩

⁷⁶ 同前引，頁 522-523。

人的「眼光」；故杜詩之「真」，以鍾、譚自我構設的詩學系統審視之，其實僅算是鍾、譚眼中之「真」，卻未必等於他人眼中之「真」。這是否就淪落為：名為閱讀古人，實則根本是讀者自說自話？某些偏激讀者確實可能墮入此境。鍾、譚的評點曾被目為「穿鑿」，⁷⁷ 恰亦由此而生。但這樣的理論系統，其實意義重大：杜詩之「真」所指為何，於焉成為一個開放性議題。表面上，詩不可解、不必解；實際上，詩的意義也緣此萬古常新、生生不息。

因此鍾惺〈再報蔡敬夫〉中的「轉語」，實是一個極值得注意的禪喻：鍾、譚在其閱讀活動中，對「真」有所體悟，形諸於評點；但更緊要的是，那些斷片式的評點文字，對《詩歸》讀者而言，何啻是一種「轉語」，猶如禪宗之參話頭，此中絕非要求讀者迷信評點，死於句下，而是期待讀者藉詩歌和評點文字的相互辯證、反覆磨勘，終能親切參悟出一己的「真」體會。鍾批杜詩：「『不相棄』、『借光輝』，書牘套語入詩，乃能深妙。請思其故。」⁷⁸ 這些字眼之所以「深妙」，並未在這段簡短批語中全盤道盡，鍾惺只是提供一種思路的引導，終究交付讀者自行去「思其故」。譚元春在一通書信說：「傳世者之精神，其佳妙者，原不能定為何處，在後人各以心目合之」，⁷⁹ 等於承認古人詩中的「精神」、「佳妙」，端賴讀者各自抉微，原無標準答案。因此何為杜詩之「真」？在鍾、譚自我創構的詩學系統下，本來就是一個開放性的議題，容許討論，自然容許異議，更成為鍾、譚以明代詩學異端之姿去遂行閱讀革命的利器。復古派自明代中葉以降，雄踞百年，聲勢浩壯，鍾、譚竟能突破重圍，震懾晚明，正須歸功於「可思而不可解」——這是杜詩評點的核心，也位居整個竟陵詩學系統要津。

(二)「杜詩入理獨妙」

鍾、譚杜詩評點可依論述重點分成兩類：一是針對實際詩作的內容和形式進行分析，二是指述杜詩在特定層面上的「特殊性」。前者容易令人產生瑣碎感，卻是後者的立論基礎。我們應特別注意後者，那麼前者的許多資料，便如網在綱。在鍾、譚的法眼觀照下，杜詩究竟有何特殊性？不能忽略鍾惺這段說法：

⁷⁷ 宋榮，《漫堂說詩》，收入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417。

⁷⁸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20，杜甫〈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頁79。

⁷⁹ 譚元春著，陳杏珍點校，《譚元春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卷28，〈答袁述之〉，頁592。

小小題，許多感慨，許大關係。詩不關理，杜詩入理獨妙。⁸⁰

這是杜甫〈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綉段〉的總批。「詩不關理」一語，就宋明詩學實況來說，大抵可理解為一種普遍性詩道。其說可溯及南宋嚴羽 (1195?-1245?)《滄浪詩話》：「詩有別趣，非關理也」，⁸¹ 也是明代復古詩學抑宋宗唐的基本前提。鍾惺批語居然聲稱：「杜詩」超然例外於此一普遍性詩道，而且評價特高。這顯然是一種對杜詩特殊性的論述，並和當代復古詩學構成了彼此頡頏的緊張關係。我們要問：何謂「入理」？何以「獨妙」？

鍾惺批語顯示：杜詩能在「小小題」中，寄寓「許多感慨」、「許大關係」。所謂「小小題」，即詩題所示張舍人餽贈了杜甫一匹珍貴的錦緞；蓋相較於群體性的社會、政治或文化等倫理議題，日常生活中朋友間的餽贈授受，乃個人性社交行為，確可視為微小的詩歌創作題材。我們不難推想：這類題材之具價值，並非出於題材本身的特性，而是取決於寄寓其中的「許多感慨」、「許大關係」，因而進一步涉及杜甫面對此一日常物事的「反應」。試複按原詩，開頭幾句敘寫張舍人餽贈錦緞的緣起，暫不可提，請注意杜甫的「反應」是婉拒：

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
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
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
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⁸²

「領客珍重意」係感念張舍人的厚誼，仍屬個人性社交行為的表述，亦為題中應有之義；下句猛然掉轉筆鋒，「顧我非公卿」，由「顧我」此一個人性身分自覺，倏地轉入「非公卿」此一群體性層次的省察。杜甫認為此一珍貴的綉緞，並不契合自己的卑微身分，假如接受餽贈，有違古來「服飾定尊卑」的禮法，擔憂招致「不祥」之「禍」。這種寫法相當特殊，杜甫主要是介意群體性的倫理問題，卻連結了個人性的罹禍之憂，這使得他的婉拒餽贈，既尊禮法，卻非板起臉孔式的訓誡，同

⁸⁰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7，頁 44。

⁸¹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7），〈詩辨〉，頁 26。

⁸²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7，頁 44。

時平添了一絲自嘲身分卑微、憂懼罹禍的幽默感。這對遭拒的張舍人，也有緩和氣氛而不致損及友誼的作用。因此杜甫的寫法，乃兼融群體性和個人性，可謂人情練達之「反應」。特就群體性層面而言，請進一步注意「寢處禍所嬰」句下鍾惺夾批：

天道、王制，小物中輕輕數語發盡，說得僭侈人夢中魂驚。⁸³

這段夾批值得細讀：第一，杜詩的「入理」，係在「小小題」中，寄寓「許多感慨」、「許大關係」；對照這段夾批所指出，此詩在「小物」中，寄寓了「天道」、「王制」，亦即尊卑禮法，可知「理」、「感慨」、「關係」就是一種群體性的倫理關懷，「入理」就是杜詩寫出了此一類群體性倫理關懷。第二，「小物中輕輕數語發盡」一語，指杜詩的「入理」，出於微小的題材，表面上屬於個人性的日常經驗。這隱然也是一種提醒：杜詩這類題材、經驗，由於「入理」，價值不容低估。第三，杜詩對於「理」的表達，並非長篇大論，而是「輕輕數語發盡」。這暗示杜詩的語言藝術簡鍊、精準，而且此「理」隱微於字裡行間，何啻也是一種有待讀者深思抉微的言外意趣。第四，針對作品與讀者的關係而言，杜甫此詩「說得僭侈人夢中魂驚」，可知杜詩之「理」，表現手法縱然隱微，但絕非晦澀、封閉，具有扣人心弦進而警世的效果。

我們尚須辨明一點：「理」作為一種群體性的倫理關懷，涵蓋層面非常廣袤，社會、政治或文化等議題外，還應包括杜甫對人類「命運」的觀照。其〈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有云：

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
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⁸⁴

此詩抒寫杜甫由夔州前往江陵的旅次之感。前文摘引的兩聯，提到舟中親見的巫山神女峰、懷想中的王昭君故宅，同時揉合了兩個景點背後的傳說和歷史故事。鍾惺有一夾批：

⁸³ 同前引。

⁸⁴ 同前引，卷 22，頁 103。

有悟頭語，說得人冰冷。⁸⁵

指杜甫透過這兩個景點的描寫，展現出某種領悟，並能渲染讀者，讓人覺得「冰冷」。杜詩寫了什麼？顯然不是對於兩個景點的客觀描繪，而是感嘆楚王和神女的浪漫愛情傳說，終究只是一場易醒的美夢，醒後所有的「歡娛」在現實中竟完全歸於渺幻；王昭君天生擁有春風般的姣好容顏，卻不得不遠嫁朔漠、魂歸異邦，所能為世人留下的徒然是一支哀怨的琵琶曲。很難說當中完全無涉於杜甫個人的身世之感，倘若「歡娛」之美好可比擬為青年杜甫意氣遄飛的豪情，然則美夢消逝無蹤，豈不正是映照著如今的遲暮傷感？王昭君「一去紫臺連朔漠」的悲慘際遇，⁸⁶不也恰似老杜「漂泊西南天地間」的顛沛流離？⁸⁷從這個角度來看，杜甫其實是藉這兩個景點、故事，去寫一己的個人經驗。而他的個人經驗也因此，不再侷限於純粹的個人經驗，而是能從人類早期歷史上找到某種先行的預示和軌則，故杜甫如此抒寫，便可說是一種諦觀人類共同之「命運」的體悟、覺醒。後世杜詩讀者倘亦有感於斯文，自然不能不對一己的「命運」無動於衷，「冰冷」一詞便是用以譬況讀者心中的震撼之感！

鍾惺的評語很簡潔，我們不成比例的剖析，無非是想指證：他所關注的杜詩之「入理」，尤可說是杜甫於字裡行間，寫出了即個人而即群體的人類共同之「命運」。杜詩之所以倍具藝術感染力，無論是「說得僭侈人夢中魂驚」、抑或「說得人冰冷」，正是因為杜甫的筆觸，不僅注目個人經驗，尚進一步昇華為群體性的倫理關懷，這當然並非古今任何詩人皆能輕易為之，是以「獨妙」。因此，「詩不關理，杜詩入理獨妙」，鍾惺對杜詩的評價基準，顯然不是某一普遍性、概括性的文體批評，而是深觀杜詩本身的獨特感染力。

由於評價基準不同，《詩歸》采錄的杜詩之作，也和復古派詩學傳統斷裂。近年研究已指出鍾、譚尤偏愛杜詩家常瑣細題材，⁸⁸其實這類作品之倍受青睞，正是基於「入理獨妙」。鍾惺指出：

⁸⁵ 同前引。

⁸⁶ 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三）〉：「一去紫臺連朔漠」、「畫圖省識春風面」、「分明怨恨曲中論」，頗能與此詩互文。此詩《詩歸》未選，見杜甫著，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卷13，頁3848-3849。

⁸⁷ 同前引，〈詠懷古跡五首（其一）〉，頁3842。

⁸⁸ 陳美朱，《明清唐詩選本之杜詩選評比較》，第3章，〈《唐詩歸》與《唐詩別裁集》之杜詩選評比較〉，頁72。

讀〈秋行官張望〉以下數詩，有寬嚴，有詳略，有巨細，綱目脈絡，委曲分明。蓋以奴婢事、帳簿語，而滿肚化工，全副王政，和盤託〔托〕出。於此將心眼放過，宜其終身口耳杜詩如未之見也。⁸⁹

這段文字雖是寫在〈催宗文樹雞柵〉總批位置，實則在《詩歸》的版面中，特指〈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暇日園中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課伐木〉、〈信行遠修水筒〉、〈催宗文樹雞柵〉五首詩。換言之，鍾惺是從所選杜詩中再圈出一個特別的「區塊」。⁹⁰ 據其題目和內容來看，此「區塊」有一個顯著的傾向，都是杜甫就日常瑣事對僕人的殷殷督課，亦即所謂「奴婢事、帳簿語」，前者指題材微小，後者指處置瑣碎，顯然可以呼應前述的「小小題」。鍾惺於此評價極高，乃至認為讀者若忽略當中的「滿肚化工，全副王政」，無異於未曾讀杜，遑論體認杜詩的真正價值。話中有無影射？我們可以發現：這五首詩，高棅《唐詩品彙》、《唐詩正聲》、李攀龍《古今詩刪》、《唐詩選》無一采錄，鍾惺欲批判、翻轉復古派詩學傳統的意圖，不言自明。鍾惺評李白〈寄東魯二稚子〉曾順帶提及：「田園兒女，老杜妙於入詩」，並與李白比較：「有家常瑣碎妙者，不讀老杜諸詩不知」，⁹¹ 這類題材之作，無疑是被視為杜詩的一大特色及價值所在。

茲舉其中一例：「信行」為杜甫僕人，曾辛勤往返四十里之遠，只為盡責修復水筒，杜甫有感遂作〈信行遠修水筒〉嘉許之。誠如鍾惺開宗明義的總批：

往往於家常瑣細，娓娓不倦，發大道理、大經濟，不酸不碎，此老胸中原有此一副本事。⁹²

杜甫如何通過家常瑣細的題材，寫出看似毫無相涉的「大道理」、「大經濟」？這其實是提示一種綱領性的讀法。此詩開頭四句：「汝性不茹葷，清靜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鍾惺便有夾批：

⁸⁹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9，頁 64。

⁹⁰ 鍾、譚所選杜詩家常瑣細題材，並不限於前揭五首，但諸作被圈為一個「區塊」，自具典型意義。「區塊」之外，〈又呈吳郎〉亦屬顯例。

⁹¹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5，頁 18。

⁹² 同前引，卷 19，頁 64。

從來經世人，本不草草，須心源清靜。從小人中看出「少滯碍」三字，可思，所謂安生慮也。是清靜人作用得力妙處。⁹³

「於斯答恭謹」句下，鍾惺進一步指出：

清靜、恭謹，才所由出；無此即小人之才矣。⁹⁴

倘非通過鍾惺的詮釋，我們未必能發覺此詩原來有如此特殊的涵義。要言之，此詩核心旨趣並非只是杜甫如何嘉許信行，而是藉由此一家常瑣細題材，觸發一種論述：舉凡「經世人」，須要保持「心源清靜」、「恭謹」。因此，信行的這種心靈特質，不僅是他在家務上任事篤實、修復水筒的關鍵，根本也是杜甫由小見大，借題發揮「經世」的觀念，是為「大道理」、「大經濟」。

承此，杜甫嘉獎信行的方式：「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譚元春下列批語同樣頗堪玩味：

大帝王語。⁹⁵

杜甫將原備自供的「浮瓜」、宿愛的「裂餅」，賜予信行，不僅是因他修復水筒的這件家務，而是「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是因「恭謹」之值得獎勵。依前面的討論，「恭謹」的心靈特質足以「經世」，那麼杜甫的賞瓜賜餅，何啻也是對於此一足以經世之恭謹心靈的肯定。在譚元春邏輯下，這便超越了主僕之情，而昇華為杜甫以「大帝王」之精神，對經世濟民層次的宏大關懷。

「入理獨妙」之說，主要是提醒讀者注意杜詩的深層意義，不能因其家常瑣細，就輕率貶抑。但針對杜詩宏大格調之作，鍾、譚也展現了相同觀念。如〈灩澦堆〉「天意存傾覆」，鍾惺夾批：「至理，即山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高意，此語深至」，譚元春更連結次句「神功接混茫」而評曰：「大有本末之言，小儒徒喜其沈雄耳」，⁹⁶ 就是顯例。「灩澦堆」為瞿唐峽口江心突起的巨石，這兩句係寫巨石長年屹立江心，既見證了造化之功，但平添往來舟楫險阻，也寓含警戒冒險躁進之

⁹³ 同前引。

⁹⁴ 同前引。

⁹⁵ 同前引。

⁹⁶ 同前引，卷 21，頁 86。

徒的悠悠天意。「山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高意」，鍾惺認為此一天意並不因人之好惡而改，此詩藉由江心巨石，寫出了一種恆久不刊的「至理」，連同譚元春所謂「大有本末之言」，皆指認杜詩中的群體性倫理關懷。但「小儒徒喜其沈雄耳」，鍾、譚掉轉筆鋒，顯然正是批判復古派固有的審美趣味。杜詩的蒼茫沉雄，確為顯著特色，鍾、譚也並未否認，但他們挪移了閱讀評賞的重心，提醒讀者多思考杜詩的深層意義。因此，〈灑灑堆〉的例子顯示：「杜詩入理獨妙」的批評效力，並非專限於家常瑣細題材，堪稱鍾、譚對杜詩的普遍性論述。

(三)「性情語」

由前文的討論中，可知杜詩宏大氣象之不足恃，相沿而下，我們尚須注意一首登望名作〈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天寶十一載（752），杜甫和岑參、儲光羲（707-760）、高適（706-765）、薛據（生卒年不詳）諸友，一起登上長安近郊的慈恩寺塔並同題賦詩。薛詩早佚，《詩歸》未錄高適，僅選杜甫、岑參、儲光羲之作。譚元春更曾宣稱杜詩之「奇老」、岑詩之「高逸」、儲詩之「杳冥」，咸屬「塔詩絕唱」，「千載不能著手矣」，⁹⁷認為杜詩與岑、儲之作各具特色，不分軒輊。這些作品在復古派選本中的采錄狀況如何？仍舉高棟《唐詩正聲》、李攀龍《古今詩刪》、《唐詩選》比較，請參閱表二。

表二：《唐詩正聲》、《古今詩刪》、《唐詩選》所選登慈恩寺塔詩之情況

作者及詩作篇目	《正聲》	《詩刪》	《詩選》
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		
岑參〈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	○	○
儲光羲〈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適〈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	

按：儲光羲全未入選，作為上述諸選本底本的高棟《唐詩品彙》亦未采錄，這應是值得專文分析的現象，暫且按下。《正聲》未選高適，其實已選入《品彙》，高棟並有夾行小註認為杜、岑、高之作「皆雄渾悲壯，足以凌跨百代」。⁹⁸李攀龍未選杜詩，似難斷言他的觀點，但參照胡應麟（1551-1602）《詩藪》：「皆才格

⁹⁷ 同前引，卷7，頁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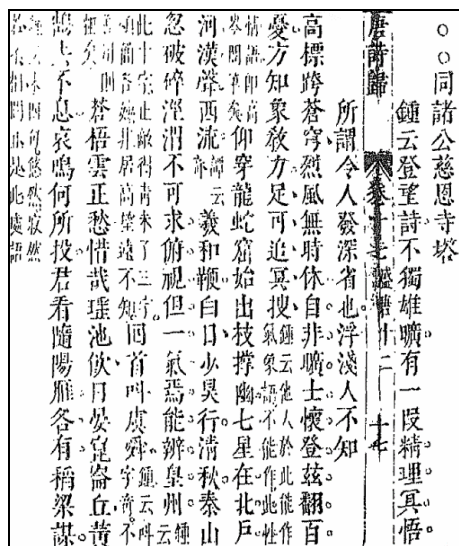
⁹⁸ 高棟編，汪宗尼校訂，葛景春、胡永傑點校，《唐詩品彙》（北京：中華書局，2015），五古，卷12，頁528。

相當，足可凌跨百代。就中更傑出者，則〈慈恩〉當推杜作」，⁹⁹ 可知李攀龍之未選杜詩，至少不能放大為復古派不喜杜甫此作，如胡應麟對杜詩更為推崇。以上梳理，乃限於論旨而唯求簡要，卻足以凸顯一個問題：且不管儲光義，《詩歸》對杜、岑詩的采錄情況，是否較缺乏革命性的特色？

其實不然。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特別注意杜詩〈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方象教力，足可追冥搜」，鍾惺有一段重要的夾批：

他人於此能作氣象語，不能作此性情語。即高、岑閣筆矣。¹⁰⁰

這段簡短的批語並未列出同行的儲、薛，反而提及了此題未選的高適。若不計此等細節，鍾惺是強調杜詩之有別於「他人」的獨特性、優越性，正在「性情語」。一般登高望遠之作，常會依隨創作者的極目所見，描摹甚或誇大雄曠之景，此即「氣象語」，而這也正是復古派的詩學追求目標。鍾惺何嘗不能感知杜詩中的宏大氣象，他更崇尚的卻是「性情語」，因而再度形成了一種閱讀評賞重心的挪移。何謂「性情語」？為方便論述，謹先彙錄評點書影如圖一。



圖一：〈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評點¹⁰¹

⁹⁹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外編，卷4，頁188。

¹⁰⁰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17，頁46。

¹⁰¹ 同前引。

這首詩的結構，可以「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為分界，此前四句乃登塔之際的自然和心理背景；厥後「仰穿龍蛇窟」以下直至終篇，乃登塔的「所見」、「所感」。¹⁰²「足可追冥搜」儼然居於承上啟下的樞紐，句旁逐字加點，其重心尤為「冥搜」二字。這句意思是說，杜甫登上佛塔，極目遠眺，親見雄曠之景之外，更自認能憑藉佛教超現實的神力妙法，激發奇幻的想像。承此，「仰穿龍蛇窟」以下，諸如銀河流轉之聲、山河破碎之狀，羲和、少昊、虞舜、西王母等神話傳說人物輪番現身，一連串敘寫，可謂「由『冥搜』而產生出『冥搜』，由『幻想』而產生『幻想』」，¹⁰³無非是杜甫奇幻想像的結晶。譚元春以「奇老」盛譽杜甫此詩，想必也有見於詩中逾半篇幅都透過「冥搜」而來。

因此，「仰穿龍蛇窟」以下，前人註釋為杜甫登塔的「所見」、「所感」，雖綱舉目張，但站在「冥搜」的角度來看，如此註釋實欠精準。因為杜甫登塔親見之景，僅是創作前的原始材料，現難親歷複按，但以〈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的「冥搜」情形，顯然這些原始材料並未如實反映於詩，在杜甫的奇幻想像驅使下，其實是對原始材料進行了大幅變造。故嚴格說，詩歌文本並未直白呈現杜甫的「所見」、「所感」，而是呈現他的「體驗」。吉川幸次郎曾注目詩中的「秦山忽破碎」，認為這不是在客觀描摹登塔之際，杜甫等人親見的「長安市郊連綿起伏的終南山脈」，杜甫是藉這幅奇幻想像下的景象，呈現一己的「體驗」，因為「象徵著社會安定的『秦山』忽然『破碎』，成為了一種不吉利的徵兆」。¹⁰⁴故通過「冥搜」，就使詩藝表現的重心，不再是對雄曠之景、宏大氣象的心摹手追，而是迴向詩人內在的「體驗」。鍾、譚評杜常說「靈幻」、「幻」，也指詩中之「體驗」。¹⁰⁵

接過吉川先生的觀點，我們必須進一步釐清：「體驗」的構成，涵蓋了兩個層次：一是「心理層」，指杜甫登望之際的心理狀態。據圖一，第三、四句「自非曠

¹⁰² 據前人註釋，「七星在北戶」以下八句是登塔所見，「回首叫虞舜」以下八句寫登塔所感。相關討論見杜甫，《杜甫全集校注》，卷2，頁297、298。

¹⁰³ 吉川幸次郎著，李寅生譯，《讀杜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續編，〈慈恩寺塔〉，頁150。

¹⁰⁴ 同前引，頁149。

¹⁰⁵ 「靈幻」、「幻」的對面是「精切」。鍾、譚於前者舉例杜詩「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後者舉例「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後者描寫舟行所見風景，確可譽為「刻畫入妙」；前者則能寫出杜甫乘舟之「體驗」，這就是「曲盡急流輕船之妙」、「寫舟行奇幻入神」。要之，鍾、譚儘能欣賞「精切」，卻更崇尚「靈幻」。這種「靈幻詩學」，涉及對古人用字遣詞的細部分析，尚待專文處理。前引文見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20，杜甫〈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頁80；卷21，杜甫〈放船〉，頁85；卷22，杜甫〈行次古城店汎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頁102。

士懷，登茲翻百憂」，逐字加圈，可見鍾、譚提醒讀者措意之處，這正是杜甫當時的心理狀態。仔細推敲，此一心理狀態不止是「憂」，尚可細分為兩個層位：「自非曠士懷」代表第一個序位，杜甫自稱性格向來並不曠達；「登茲翻百憂」代表第二個序位，指登塔之際憂思叢生、翻騰。第一個序位暗示此憂蘊蓄、沉積已久，具有先在性，洵非瞬時片刻偶然興起的念頭；第二個序位意味著此一先在性的憂思，受到當下登塔活動及其所見景物觸發、激盪、蔓延開來，令杜甫深陷其中。二是「語言層」，指杜甫的憂思成為詩藝表現的重心。此時杜甫透過「冥搜」，對原本所見實景進行了大幅變造。讀者之能感知杜甫的「體驗」，正因這份體驗已落實到具體的「語言層」。

立足前述的討論，我們可以重新回到「氣象語」、「性情語」，進行更精確的分析。即使暫就概念表面而言，「性情語」係指藉用語言，使某種經驗、感受進入詩歌文本，不難理解這就是前述所謂「體驗」。而〈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詩的「氣象」，其實不可不謂宏大，仍能結合奇幻想像之筆，去呈現杜甫的「體驗」，這顯示杜詩中的「氣象語」、「性情語」，原非必然互斥，乃是混融一體。但鍾批：「他人於此能作氣象語，不能作此性情語」，對杜甫以外其他創作者而言，能此而不能彼之間，就形成了互斥的局面。此時「他人」皆能的「氣象語」，顯然不被視為寓含「體驗」；這種「氣象語」，可說是缺乏「心理層」，純粹是就「語言層」去進行創作，而且也正由於缺乏「心理層」的基礎，「語言層」的成品就毫無「體驗」可言。明代復古派詩歌多氣象恢弘之作，卻常遭抨擊缺乏真情實性，正因復古派詩人忽略了「心理層」，執迷於「語言層」。有別於「他人」，杜甫「能作此性情語」，則是立足「心理層」的基礎，進而落實到「語言層」。其「語言層」的部分不必然刻意追求或排斥「氣象語」，氣象恢弘與否本非詩歌創作之重心，故家常瑣細題材亦可入詩；創作活動的首務在於服膺「心理層」，方以適切的語言去表現某種內在的經驗、感受，亦即「體驗」。杜詩創作重心在此，故特稱為「性情語」，以區隔於「他人」罔顧「心理層」的「氣象語」。從閱讀的角度來說，鍾惺係警醒讀者須能穿透杜詩的「語言層」，進入更深邃的「心理層」。閱讀評賞的重心，因此並不在於「氣象語」，而在於「性情語」。

前文通過「心理層」、「語言層」的釐析，進而論及「性情語」、「氣象語」的分合、本末，應有助於認清：「性情語」實際上就是詩歌文本中潛藏的「體驗」。我們不難聯想，以鍾、譚更常標舉的術語而言之，那也就是「性靈」、「精神」。因此，如何挖掘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中的「性情」、「性靈」、「精

神」，而不致炫迷於詩歌文本表層的宏大氣象，其實直契《詩歸》核心。

杜甫此詩是登高望遠主題，「景物」在創作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故我們尚須注意，「性情語」還進一步涉及創作者與景物的關係議題。茲分兩個層次討論：第一，由於「自非曠士懷」，杜甫係懷著先在性的憂思去觀景、寫景，這導致原本親見的客觀景物，進入詩歌文本後，成為憂思之「投影」。第二，由於「登茲翻百憂」，杜甫原本親見的客觀景物，成為他當下憂思翻騰不已的「觸媒」。就此而言，創作者並非以一己感受、經驗去觀照外物，反倒像是景物本自蘊具某種特殊的性情，宛如有情世界，方而觸引、感染了創作者。

在實際作品中，「投影」、「觸媒」兩個層次當然無法切割開來。誠如《文心雕龍·物色》：「情往似贈，興來如答」，¹⁰⁶彼此之間實為回環往復，相互辯證。但依鍾惺此詩總批，「觸媒」一端顯然特受關注：

登望詩，不獨雄曠，有一段精理冥悟，所謂「令人發深省」也！浮淺人不知。¹⁰⁷

重申登高望遠之作，並不貴在如何追摹雄曠之景，而貴在「精理冥悟」。參照「氣象語」、「性情語」的對舉架構，我們其實可將「精理冥悟」，視為「性情語」的一個腳註。隨後隨即拈出的「令人發深省」，取自杜甫〈遊龍門奉先寺〉的結語，鍾惺原有一段夾批：

胸中無「深省」二字，不可入山水、禪林間。¹⁰⁸

又據原詩總批：「此詩非結語，便不必收」，¹⁰⁹可知「深省」是鍾惺的重要觀念。複按〈遊龍門奉先寺〉：「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係指杜甫清晨時聽聞奉先寺的鐘聲，無意之間，對於自我生命產生了更深刻的省悟、覺察。「晨鐘」因而成為一種「觸媒」。我們或許會好奇：「晨鐘」為何會有如此深妙的效用？這大抵是佛教的神力妙法使然，故上述鍾惺夾批提到了「禪林」。因此，作為「觸媒」的，其實尚非「晨鐘」，而是佛法、佛剎。上述鍾惺夾批還提到了「山水」，也是

¹⁰⁶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卷10，頁695。

¹⁰⁷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17，頁46。

¹⁰⁸ 同前引，卷18，頁49。

¹⁰⁹ 同前引。

類似的觀念。如杜甫〈萬丈潭〉「青谿合冥冥」，指這座潭水本自幽深清寂，「合冥冥」加圈，鍾惺評曰：「讀此三字，謂山水無理，吾不信也」，¹¹⁰ 所謂「山水」的「理」，就是此一潭水本然自具的幽深清寂特質，能給人某種生命的省覺。換言之，無論宗教或自然，都能於冥冥之中成為生命昇華的「觸媒」。

杜甫之登上「慈恩寺塔」，進而「極目遠望」，可謂兼得宗教與自然之力。因此，重新回到〈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總批，鍾惺之特別拈出「令人發深省」，正是藉以詮說：杜甫從登慈恩寺塔極目遠望的景物中，遂使一己的生命——包括原本先在性的憂思，進而昇華而獲致一種更細膩、深刻的省覺，此即「精理冥悟」。其間的「觸媒」，既指極目所見之自然，也指宗教，杜甫說得很清楚：「方知象教力」。可見佛教的神力妙法，何止促成詩歌創作活動的「冥搜」，更緊要者，還促成了杜甫自我生命的「深省」。從這個角度來看「性情語」，我們有必要特別強調：所謂「性情」，絕非尋常生活中隨境起伏的情感、情緒之義，其實乃是自我生命的「深省」。借用柯慶明的說法，杜詩此刻所為讀者展示的，「不只是一種純粹的美感經驗，而同時是一種對生命的沉思，生命意識的高度自覺」。¹¹¹

一如稍早所論，「性情語」之說堅定地指向杜詩宏大氣象之不足恃，對復古派詩學傳統而言，這當然是一場直截根源的「革命」。但我們於前文並曾屢言，鍾、譚其實並非片面貶抑「氣象語」，主要訴求乃在於釐清本末問題。就實際詩歌文本來看，他們是如何閱讀杜詩的「氣象語」？這自是值得併瞭解的問題。在〈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中，「俯仰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正是典型的宏大氣象，不但逐字加圈，鍾惺並有一段夾批：

此十字只敵得「青未了」三字。煩簡各妙，非居高望遠不知。¹¹²

所提「青未了」，指杜甫〈望嶽〉起首二語：「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鍾惺該詩總批：

此詩妙在起，後六句不稱。¹¹³

¹¹⁰ 同前引，頁 55。

¹¹¹ 柯慶明，《文學美綜論》（臺北：長安出版社，1983），〈談「文學」〉，頁 6。

¹¹² 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7，頁 46。

¹¹³ 同前引，卷 18，頁 49。

對於這兩句別具青眼。再看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譚元春評：

「萬古」字，入得博大；「青濛濛」字，下得幽眇。¹¹⁴

鍾惺則仍拈出「青未了」：

「秋色」四語寫盡空遠，少陵以「齊魯青未了」五字盡之，詳略各妙。¹¹⁵

綜觀之，前引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望嶽〉、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均為典型的「氣象語」，足證鍾、譚並未刻意貶斥。但問題在於，鍾、譚對這些詩句的評賞重心，卻也明顯並不在於宏大氣象之展現：鍾惺較注意「煩簡」、「詳略」，以及全篇結構中稱與不稱的現象，譚元春肯認岑參用字「博大」，但其措意恐怕在與隨後的「幽眇」，構成了對比張力。可見鍾、譚雖能欣賞這些「氣象語」，然而所以欣賞之由，並非「氣象」，正所謂：「妙在不廣大」。¹¹⁶換言之，這仍是一種閱讀評賞重心的挪移。何況「他人於此能作氣象語」，「氣象語」變成了眾所皆能的尋常筆墨，其詩學意義已大幅降級。

《詩歸》中的杜詩評點既繁且細，即使扣除大量「初步印象」式的文字，如何確切掌握鍾、譚詩學系統，洵非易事；甚至鍾、譚以精簡評點形式去呈現的詩學觀念，究竟有無「系統」而言，也是值得後設省思的問題。但我們若暫不預設所謂「嚴密」系統的必然存在，經反覆閱讀而視其大體，當可理解前文依序鎖定的「可思而不可解」、「杜詩入理獨妙」、「性情語」，三個觀念術語，對於杜詩閱讀來說，在在都是革命性的重要論述。簡要歸結：「可思而不可解」強調杜詩妙處無法名言，美感不在於語言淺表，亟仰讀者之「思」抉微。「入理獨妙」指杜詩題材無論巨細，其最核心的價值乃在於詩歌文本中潛藏的群體性倫理關懷。至於「性情語」，則更強調杜詩的內涵，何止是尋常生活中浮光掠影的情感、情緒，乃昇華為一種對於自我生命的深細省覺。上述三個觀念術語，其實都是透過不同層面、不同

¹¹⁴ 同前引，卷 13，頁 677。

¹¹⁵ 同前引。

¹¹⁶ 此為譚元春評杜詩〈暫住白帝復還東屯〉。同前引，卷 21，頁 85。

的詩例，去反省復古派之於體格聲調、宏大氣象的迷思。杜詩〈閩水歌〉譚元春總批：

選杜詩，最要存此等輕清澹泊之派，使人知老杜無所不有也。¹¹⁷

「無所不有」自是承接傳統的杜詩集大成觀點，但此處特舉「輕清澹泊」為說，恐怕也是要抗衡復古派。在岑參〈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中，譚元春夾批便認為創作此一主題，「莊重典雅，經史奪目，惟老杜有此手段」，此詩別出新法，「嘉州以清韻筆奄有之，可見何所不能」，¹¹⁸ 和上述觀點相當近似，只是換了評述的對象。譚元春對「輕清澹泊」、「清韻」的愛賞，乃至於鍾惺從初盛唐七律的「癡重」思及：「『氣格』二字蔽卻多少人心眼」，¹¹⁹ 都是意有所指的。在這種爭辯下，一種詩歌觀逐漸朗現——詩的美感不在語言淺表，而在深處，甚至是一種難以名言捉摸的深處。詩人超以象外得其環中，讀者焉得不然？〈九日藍田崔氏莊〉鍾評：「『子細看』三字悲甚，無限情事，妙在不曾說出」，¹²⁰ 讀者的任務就是要去挖掘文本淺表未嘗明確說出的、甚至根本難以詳述縷析的某種美妙，因而形成一種獨特的「深度閱讀」。〈重過何氏〉鍾評：「字字是『重過何氏』，卻無著意顧瞻之痕」，¹²¹ 〈擣衣〉領聯鍾評：「一字不及擣衣，掩題思之，卻字字是擣衣」，¹²² 亦皆如此。

四、結語：革命是否成功？

「詩人」如何不只是個人的身分和志業，而更能成為瓣香世傳的家業？杜甫在〈宗武生日〉中殷切叮嚀兒子：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

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¹²³

¹¹⁷ 同前引，卷 20，頁 71。

¹¹⁸ 同前引，卷 13，頁 682。

¹¹⁹ 同前引，卷 16，頁 35。

¹²⁰ 同前引，卷 22，頁 97。

¹²¹ 同前引，卷 20，頁 80。

¹²² 同前引，卷 21，頁 87。

¹²³ 同前引，卷 22，頁 105。

偏偏譚元春〈詩歸序〉曾直言批判世人遭復古派蒙蔽，迷信「《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求於靈迴朴潤」，他該如何面對杜甫此詩？其夾批云：

蘇長公不服昭明，此古今達識確論也。而老杜每稱《文選》。然有老杜之才，亦不妨誦《文選》耳。¹²⁴

譚元春抬出蘇軾(1037-1101)為說，其論述意見，暫不旁涉；¹²⁵ 請注意上文最末二語：若有杜甫之才，便可讀《文選》。我們不曉得宗武有無乃父之才、是否熟讀《文選》，譚元春在此卻是婉曲地建議世人束之高閣。這種論述姿態，令人想起胡應麟《詩藪》所言：「杜則可，學杜則不可」，¹²⁶ 蓋杜甫高才自能駕馭險拗粗拙之筆，後世學杜者卻須衡量己力而知所進退。可見杜詩作為「經典」，何止樹起一個詩學標竿，使人知曉詩歌創作的意義和方向；但努力奔向此一標竿之時，也不禁讓人滋生困惑：我們應當循著杜甫所教導、所踐履的方法去作詩？或宣告杜甫那套方法或踐履方式其實不適用於後世多數人？這是大哉問，復古派乃至於整個宋明詩學取向大抵選擇了前者，鍾、譚則孤傲地步上後途。緣此，他們對於什麼是詩？能否由杜甫的創作實踐中，憑藉細膩繁複的選詩和評點，重新萃取出杜詩之所以為「真」、為「妙」的詩歌觀、創作觀？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閱讀活動？這是擺在兩人面前毫無迴避餘地的根本問題，終而引爆「革命」。

依鍾、譚立志「拈出古人精神」的氣魄，這場革命首先是「閱讀革命」，緊續方有「創作革命」。本文將鍾、譚詩學置入閱讀層面，試圖拓展晚明詩學研究的觸角，故瞄準《詩歸》的杜詩選評，進論此中閱讀革命的短兵交鋒。具體的研討工作和架構，乃由「選」、「評」雙線鋪開：我們先鎖定鍾惺自認「獨與世異同」的杜甫七律選目，參照復古派前行選本，便可豁顯《詩歸》中刻意捏塑的杜詩新典律。更重要的是鍾、譚如何憑藉繁細的「評點」，刷新晚明詩學風景？文中通過評點文字和杜詩文本的反覆磨勘、相互參證，即可貞定「可思而不可解」、「杜詩入理獨妙」、「性情語」，在在是劃時代的革命性論述。鍾、譚的革命行動何僅此也，他們為世人編定了新選本《詩歸》，同時呼籲世人拋開舊選本《文選》、《詩刪》之

¹²⁴ 同前引。

¹²⁵ 詳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49，〈答劉沔都書書〉，頁1429-1430。

¹²⁶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5，頁92。

類，兩造水火不容，可見他們不但提出新說，並有濃厚的專制意味。

實際上，這場革命旨在倡導一種「深度閱讀」。何以深度？此中不講詩歌文本表層的體格聲調、氣象恢弘，連「比興」的表現手法也都不復必備。深度為何？鍾、譚非常重視詩歌文本深層的不言之妙，既「不可解」，也「不必解」，這使文獻學喪失了著力點，也導致詩歌與詩人傳記、歷史背景的關係，出現一種疏離化的傾向。尤其杜詩向來號稱「詩史」，這其實是宋明詩學無論尊抑與否，常見談述的公共話題，整部《詩歸》居然絕口不提此二字，彷彿世間未曾有過此說。所選杜詩中最接近傳統「詩史」之作，可舉一例〈留花門〉，鍾惺總批雖云：「說盡客兵之害，千古永戒，然此外還有隱憂」，卻非為了詩史互證，其夾批一如他作，僅簡潔提示杜甫用字造句意在言外，是為「妙」處。¹²⁷ 在鍾、譚的「深度閱讀」下，許多傳統詩學觀念瞬間失效。許學夷《詩源辯體》記載：

鄒彥吉最稱好奇，及見《詩歸》，曰：「不意世間有此大膽人！」¹²⁸

鄒迪光 (1550-1626) 屬復古派，唯論詩頗尚奇趣；¹²⁹ 儘管如此，展讀《詩歸》仍倍感震懾。鍾惺曾對鄒氏執弟子禮，容或不便遽斷鄒說的真正意圖，但一經載入許學夷書中，恰能凸顯竟陵詩學超乎尋常的強大衝擊力。政治末世的晚明，難道也墮入了黑暗的詩學末世？「詩」何去何從？「震懾」、「衝擊」之餘，傳統詩學信徒恐怕也將陷入一種悠深的悵惘。

由檢討復古派出發，鍾、譚既對「杜詩讀者」要求如是，但兩人的評選究竟能為「《詩歸》讀者」提供什麼呢？前文曾談過這個問題，當時我們的回答是：可提供一種新觀念，促使杜詩之「真」成為開放性議題，其意義實屬重大。但我們必須「再反省」：如果詩歌閱讀活動的終點係在感知某種無法名狀的美妙，這份奧祕且又亟賴讀者各出手眼加以抉微，殊無標準答案，那麼這種閱讀方式和成果，與空疏浮薄之危機是否僅在一線之隔？因而鍾、譚革命是否成功，仍需明清之際續作評判，似亦未嘗不能提供今日讀詩人之省思。

(責任校對：廖安婷)

¹²⁷ 詳見鍾惺、譚元春編，《唐詩歸》，卷 17，頁 40。

¹²⁸ 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卷 36，頁 372。

¹²⁹ 鄒迪光詩學論見及其與許學夷的關係，可參閱謝明陽，〈許學夷《詩源辯體》在晚明的傳播與接受〉，《東華人文學報》，5（花蓮：2003），頁 316-324。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方以智 Fang Yizhi, 《通雅詩說》 *Tongya shishuo*, 收入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 《明詩話全編》 *Ming shihua quanbian* 第 10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06。
- 王夫之 Wang Fuzhi 評選, 陳新 Chen Xin 校點, 《明詩評選》 *Mingshi pingxuan*, 北京 Beijing: 文化藝術出版社 Wenhua yishu chubanshe, 1997。
- 王世貞 Wang Shizhen, 《弇州四部稿》 *Yanzhou sibu gao*,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284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王世貞 Wang Shizhen 著, 羅仲鼎 Luo Zhongding 校注, 《藝苑卮言校注》 *Yiyuan zhiyan jiaozhu*,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21。
- 永瑤 Yongrong 等, 《四庫全書總目》 *Siku quanshu zongm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3。
- 朱彝尊 Zhu Yizun 著, 姚祖恩 Yao Zu'en 編, 黃君坦 Huang Juntan 校點, 《靜志居詩話》 *Jingzhiju shihua*,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98。
- 宋 肇 Song Luo, 《漫堂說詩》 *Mantang shuoshi*, 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 《清詩話》 *Qing shihua* 上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9。
- 李攀龍 Li Panlong 選, 《古今詩刪》 *Gujin shishan*,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382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李攀龍 Li Panlong 編, 蔣一葵 Jiang Yikui 箋釋, 《唐詩選》 *Tangshi xuan*,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309 冊,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shushe, 1997, 明刻本 Ming keben。
- 杜 甫 Du Fu 著, 蕭滌非 Xiao Difei 主編, 《杜甫全集校注》 *Du Fu quanji jiaozhu*,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13。
- 周亮工 Zhou Lianggong 著, 朱天曙 Zhu Tianshu 編校整理, 《周亮工全集》 *Zhou Lianggong quanji* 第 3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08。

- 胡應麟 Hu Yinglin, 《詩藪》 *Shiso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79。
- 袁中道 Yuan Zhongdao 著, 錢伯城 Qian Bocheng 點校, 《珂雪齋集》 *Kexuezhai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9。
- 袁宏道 Yuan Hongdao 著, 錢伯城 Qian Bocheng 箋校, 《袁宏道集箋校》 *Yuan Hongdao ji jianjiao*,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1。
- 高 棅 Gao Bing, 《唐詩正聲》 *Tangshi zhengsheng*,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奎文館主人識本 *Zaodaotian daxue tushuguan cang Kuiwenguan zhuren zhiben*。
- 高 棅 Gao Bing 編, 汪宗尼 Wang Zongni 校訂, 葛景春 Ge Jingchun、胡永傑 Hu Yongjie 點校, 《唐詩品彙》 *Tangshi pinhu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5。
- 許學夷 Xu Xueyi 著, 杜維沫 Du Weimo 校點, 《詩源辯體》 *Shiyuan bianti*,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98。
- 陳巖肖 Chen Yanxiao, 《庚溪詩話》 *Gengxi shihua*, 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 《歷代詩話續編》 *Lidai shihua xubian* 上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3。
- 賀貽孫 He Yisun, 《詩筏》 *Shifa*, 收入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 《明詩話全編》 *Ming shihua quanbian* 第 10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06。
- 楊 慎 Yang Shen 著, 王大厚 Wang Dahou 箋證, 《升庵詩話新箋證》 *Sheng'an shihua xin jianzheng*,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8。
- 劉 勰 Liu Xie 著, 范文瀾 Fan Wenlan 注, 《文心雕龍注》 *Wenxin diaolong zhu*,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01。
- 錢謙益 Qian Qianyi, 《列朝詩集小傳》 *Liechao shiji xiaozh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 錢謙益 Qian Qianyi 著, 錢曾 Qian Zeng 箋注, 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標校, 《牧齋初學集》 *Muzhai chuxue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5。
- 謝 榛 Xie Zhen 著, 李慶立 Li Qingli、孫慎之 Sun Shenzhi 箋注, 《詩家直說箋注》 *Shijia zhishuo jianzhu*,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shushe, 1987。
- 鍾 惺 Zhong Xing 著, 李先耕 Li Xiangeng、崔重慶 Cui Chongqing 標校, 《隱秀軒集》 *Yinxiuxuan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2。

- 鍾 惺 Zhong Xing、譚元春 Tan Yuanchun 編，《唐詩歸》*Tangshi gui*，《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589-159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明刻本 Ming keben。
- 譚元春 Tan Yuanchun 著，陳杏珍 Chen Xingzhen 點校，《譚元春集》*Tan Yuanchun ji*，武漢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2016。
- 嚴 羽 Yan Yu 著，郭紹虞 Guo Shaoyu 校釋，《滄浪詩話校釋》*Canglang shihua jiaosh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1987。
- 蘇 軾 Su Shi 著，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蘇軾文集》*Su Shi wen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9。

二、近人論著

- T. S. Eliot 著，翁廷樞 Weng Ting-shu 譯，〈傳統與個人才具〉“Chuantong yu geren caiju”，《中外文學》*Zhongwai wenxue*，2.9，臺北 Taipei：1974，頁 146-154。
doi: 10.6637/CWLQ.1974.2(9).146-154
- 列奧·施特勞斯 Leo Strauss 著，劉鋒 Liu Feng 譯，《迫害與寫作藝術》*Pohai yu xiezuoye yishu*，北京 Beijing：華夏出版社 Huaxia chubanshe，2012。
- 吉川幸次郎 Yoshikawa Kojiro 著，李寅生 Li Yinsheng 譯，《讀杜札記》*Du Du zhaji*，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1。
- 周作人 Zhou Zuoren 著，鍾叔河 Zhong Shuhe 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Zhou Zuoren sanwen quanji* 第 7 卷，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9。
- 柯慶明 Ko Ching-ming，《文學美綜論》*Wenxue mei zonglun*，臺北 Taipei：長安出版社 Chang'an chubanshe，1983。
- 許建業 Hui Kin-yip，〈舊題李攀龍《唐詩選》的早期版本及接受現象〉“Jiuti Li Panlong *Tangshi xuan de zaoqi banben ji jieshou xianxiang*”，《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5，北京 Beijing：2018，頁 145-157。
- 陳美朱 Chen Mei-chu，《明清唐詩選本之杜詩選評比較》*Ming Qing Tangshi xuanben zhi Dushi xuanping bijiao*，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15。
- 陳英傑 Chen Ying-chieh，《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Mingdai fugupai Dushi xue yanjiu*，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18。
- 陳國球 Kwok-kou Leonard Chan，《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Mingdai fugupai Tang shilun yanji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7。

- _____, 〈復古餘波——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初探〉“Fugu yubo: Tang Ruxun Huibian Tangshi shi ji chutan”, 《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29, 臺北 Taipei: 2018, 頁 51-79。doi: 10.30407/BDCL.201806_(29).0003
- 陳廣宏 Chen Guanghong, 《竟陵派研究》*Jinglingpai yanjiu*,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06。
- 曾守仁 Tseng Shou-je, 〈魔、鬼與真詩——試論竟陵詩學話語中的離心性〉“Mo, gui yu zhenshi: shi lun Jingling shixue huayu zhong de lixinxing”, 《輔仁國文學報》*Furen Guowen xuebao*, 30, 新北 New Taipei: 2010, 頁 201-225。doi: 10.29445/BDCLFJCU.201004.0010
- _____, 〈冷人、幽器與鬼趣：試論鍾、譚的人、詩與批評〉“Lengren, youqi yu guiqu: shi lun Zhong, Tan de ren, shi yu piping”, 《文與哲》*Wen yu zhe*, 18, 高雄 Kaohsiung: 2011, 頁 397-428。
- 黃景進 Huang Jing-jin, 〈詩之妙可解？不可解？——明清文學批評問題之一〉“Shi zhi miao ke jie? bu ke jie?: Ming Qing wenxue piping wenti zhi yi”, 收入呂正惠 Lu Cheng-hui、蔡英俊 Tsai Ying-chun 主編, 《中國文學批評(第一集)》*Zhongguo wenxue piping (di yi ji)*,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92, 頁 1-45。
- 黃維樑 Huang Wei-liang, 《中國古典文論新探》*Zhongguo gudian wenlun xintan*,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6。
- 楊玉成 Yang Yu-cheng, 〈閱讀邊緣：晚明竟陵派的文學閱讀〉“Yuedu bianyuan: wan Ming Jinglingpai de wenxue yuedu”,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主辦, 「明清計畫專題座談」“Ming Qing jihua zhuan ti zuo tan”, 臺北 Taipei: 2003 年 9 月 19 日, 未刊修訂稿 Wei kan xiuding gao, 頁 1-71。
- 鄔國平 Wu Guoping, 《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Jinglingpai yu Mingdai wenxue pipi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4。
- 謝明陽 Hsieh Ming-yang, 〈許學夷《詩源辯體》在晚明的傳播與接受〉“Xu Xueyi Shiyuan bianti zai wan Ming de chuanbo yu jieshou”, 《東華人文學報》*Donghua renwen xuebao*, 5, 花蓮 Hualien: 2003, 頁 299-337。doi: 10.6420/DHJHS.200307.0299

A Reading Revolution: On the Jingling School's Criticism of Du Fu'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en Ying-chieh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enyc@nccu.edu.tw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events in the Late Ming was the challenge to the revivalist school issued by Zhong Xing 鍾惺 (1581-1624) and Tan Yuanchun 譚元春 (1586-1637)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ir *Shigui* 詩歸. In this book, they confidently asserted that their views represented the “Ancient spirit” as they sought to refute the ideas of the revivalist school. Since this conflict concerned the proper way to “read” poetry, it can be called a “reading revolution.” What meaningful changes did this revolution bring to the history of poetics in the Late Ming? How did it affect the revivalist schoo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Zhong and Tan’s selections and criticism of Du Fu’s 杜甫 (712-770) poetry. First, it sheds light on the new canon of Du’s poetry that the *Shigui* created, and compares this canon with that of the revivalist school. Second, it demonstrates that *ke si er bu ke jie* 可思而不可解, *Dushi ru li du miao* 杜詩入理獨妙, and *xingqing yu* 性情語 all constitute epoch-making points.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summary and evalu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Zhong and Tan’s positions.

Key words: Zhong Xing 鍾惺, Tan Yuanchun 譚元春, *Shigui* 詩歸, the Jingling school 竟陵派, the revivalist school, Du Fu’s poetry 杜甫詩

(收稿日期：2022. 10. 28；修正稿日期：2023. 1. 28；通過刊登日期：2023. 3. 7)

